



費 甲

蘇美外長會議與限武協議

蘇聯外交部長謝瓦納澤於九月十三日飛抵華盛頓，並於十五日與美國國務卿舒茲展開全面發表聯合公報；指出兩國政府已就銷毀中程和中短程核導彈問題，以及在會見美國總統雷根時，將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的私人信函交與雷根總統。九月十八日，雙方兩國亦同意加緊努力於削減百分之五十的長程戰略武器談判，俾能儘早締結條約。雙方外長將於十月下旬在莫斯科進行另一回合會談。

根據目前達成的原則性協議，兩國將在今後三至五年內，全部銷毀射程一千至五千公里的中程導彈和射程五百至一千公里的中短程（戰術作戰）導彈。亦即蘇聯承諾銷毀部署在歐亞兩洲的四四一枚SS-20導彈、一一枚SS-4導彈，以及在東歐的一三〇枚SS-12、SS-23導彈。美國將銷毀部署在西歐的三三二枚潘興—A導彈和戰斧式陸基巡弋導彈，並將停止部署計劃中的另外二四〇枚巡弋飛彈。此次談判所留下的技術性問題，比如銷毀導彈的時間表和查核措施，將由兩國在日內瓦的代表進行商談。如果這項協議能在秋末兩國首腦會談時，正式簽訂協定，將是美蘇關係在八〇年代的新起步。雙方削減既存中程及中短程核武器，對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有促進作用，兩國關係更可進一步和緩及改善。

但是這並非意味著美蘇關係從此一帆風順。在雙方關係中仍然存在一些難以克服的爭議與外在的干擾因素。首先必須瞭解，此次協議祇涉及雙方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的核彈庫存量，龐大的洲際彈道飛彈和戰術、戰場核彈尚未達成協議。仍在進行中的長程飛彈談判，其成功機率至多祇有五成。第二，隨著科技進步，美蘇爭霸全球的競技場業已轉移至太空。無論是中程或中短程飛彈，甚至是洲際飛彈，都已不是決定勝負的主要因素。現今美國仍全力發展「星戰計劃」；蘇聯在反對無效下，亦加緊太空科技的研究與運用。雙方在太空武器的發展和競賽上，將隱伏更深的互不信任或衝突危機。第三，美國內部對美蘇和解仍持不同看法，以政府而言，國務院的緩和政策與國防部的備戰反蘇立場迥異。雷根卸任後，未來美國總統的政策是否會廣續目前的廢核目標，仍屬未知之數。第四，西歐國家雖然贊同美蘇裁核，但私下對蘇聯強大的傳統武力仍感受威脅。過去全憑美國核子武力嚇阻東歐集團，一旦這種核嚇阻不再存在，會出現什麼局面甚難逆料。最近（九月廿一、廿四日）西德和法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即顯示著西歐國家團結自救的傾向。第五，蘇共領導雖然主張廢核裁軍，呼籲將軍備競賽費用移作經濟發展建設。但是不能排除蘇聯內部存在反對廢核勢力的可能性；而且蘇聯經濟改革的成敗與否將影響戈巴契夫政策的延續。最後，無人敢於肯定當蘇聯經濟改革成功後，不會將其資源重新分配，再度提高軍事費用。

蘇聯學者評介中共經濟改革

蘇聯經濟報（*Ekonomicheskaya Gazeta*）編輯部自稱收到不少的讀者來信，詢問關於中共經濟改革的內容和基本方向。該報為此特別舉辦圓桌會議，邀請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和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經濟研究所的學者，討論中共經濟改革基本方向。由此可見蘇聯人民對於中共經改深感興趣，甚至可能相信蘇共領導中央近三年在本國推行的改革亦係受到中共改革之影響。

遠東研究所所長齊塔連柯（M. Titarenko）率先表示中共經濟學者創造性的尋求目標主要是考慮價格規律作用、發展商品貨幣關係、提高經濟管理的角色。他認為，中共現階段改革的三個基本方向是：恢復企業活動生機、發展社會主義商品市場、運用經濟槓桿作用。賦予企業生機的作法是，擴大企業經營的權利和義務，以徵收所得稅代替原有的利潤上繳制度，扣除稅後的利潤由企業自主運用。中共將組成的商品市場包括生產資料、勞動力、金融、科技資訊。一九八五年中共有二萬二千個貿易中心和自由市場，其中二萬一千個在農村地區。而勞動服務公司屬於新型的勞力分配單位，透過公司以契約工僱用取代原來的中央分派；企業幹部的選任則需經國家考試，以及企業直接選聘。

中共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包括國家所有與集體所有兩種形式，此外，中共正發展個體部門和中外合資部門。蘇聯學者柯諾瓦洛夫（E. Konovajov）認為，中共現存的各種經濟所有制並非削弱社會主義所有制的主導角色。在一九七九年，中共工業產值百分之百出自社會主義所有制企業；到一九八六年仍然高佔百分之九十八。一九八六年底，中共註冊的私人商業和工業企業共有四百四十二萬個，此外有三萬二千家股份公司。外國資本參與的企業共七千七百三十家。企業之間逐漸形成競爭，因而恢復市場經濟機能。個體企業的發展由於法規不健全，導致日益增多的經濟犯罪和舞弊案件以及對個體企業不公正的壓制情事。破產法業已制訂，但並未付諸實施，僅係實驗性質；中共將經營不良的企業租給個人或集體。一九八五年內共有六萬四千七百家商業與服務業小型國有企業租給個人經營，佔同類企業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五點四。一九八六年國營企業出租家數又增逾半倍。

根據蘇聯學者之看法，顯然肯定中共經濟改革的成效，並且相信蘇聯與中共交換國民經濟管理經驗和資訊，有助於進一步改善雙方經濟體制。對於經改產生的矛盾和弊病，包括物價上漲、財產分配不均，並未抱持排斥態度。大概認為這種現象難以避免或制度未趨完善之前的自然現象。蘇聯學者肯定中共仍是社會主義社會所有制「國家」，此點與西方國家的學者認為中共可能資本主義化之看法迥然不同。即使中共擴大個體企業數量和範圍，增加吸收外資，國有企業仍是中共經濟生產主體。經濟改革與開放雖然造成「資產階級思想自由化」傾向，但已遭到中共政權的壓抑。由此可證明，中共不可能蛻變為資本主義體制；相反地，當蘇聯與中共同時推動經濟改革，互有需求和取法時，雙方的合作將愈形密切，關係愈加友好。

莫斯科舉行國際圖書展覽會

由蘇聯國家出版委員會主辦的第六屆莫斯科國際圖書展覽會於九月八日揭幕，十四日結束。在一九七七年首度舉行時，有一、五三五家公司和組織，分別來自六十七個國家和三個國際組織參加展出。本屆共有三千多家公司，來自一〇三個國家和十三個國際組織、三個民族組織。蘇共中央宣傳部長斯克梁羅夫（Yu. A. Sklyarov）和其他部會首長皆出席開幕典禮。書展籌備委員會主席、蘇聯國家出版委員會主席涅那謝夫（M. F. Nenachev）宣讀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的書面賀詞；聯合國副秘書長維茲涅爾宣讀聯合國秘書長裴瑞斯的賀詞。

兩年一度的國際書展不僅是蘇聯與各國出版界交換圖書、資訊的場合，而且是各國出版公司相互交易的所在。會場內設有商業中心和洽談室，供蘇聯出版機構與外國公司談判、商談長期合作計劃、聯合企業及商務事宜。蘇聯提供逾七千種出版品（以西方語文譯本為主）和雜誌、唱片、郵票、

複製品，與外國公司交易。此次書展共交易了一千六百萬冊書籍。

蘇聯的出版業務相當發達，每年大約出版二十五億冊書籍、小冊子；全國共有三十多萬所社會圖書館，貯藏圖書逾五十億冊；私人藏書估計超過四百億冊。但這不意味著可以滿足社會大眾的需求，涅那謝夫即表示藝術類圖書祇能滿足半數需要，兒童圖書祇能供應實際所需的百分之三十五，百科全書類更無法滿足需求。舉辦書展為蘇聯提供最佳的吸收外國科技知識的機會；此次書展交換所得的科技類新書將送往西伯利亞和俄屬遠東地區的都市巡迴展出，最後將由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的圖書館收藏。每年蘇聯進口圖書比出口要多出兩倍，自美國的進口多出三倍，自英國的進口多出十一倍。當然，從參展公司之眾可見得大部份外商均認為與蘇聯交易有利可圖；而且從這種大規模交易會亦可看出蘇聯吸收外國新知的容量是相當可觀的。

俄羅斯部長會議主席論改革

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俄羅斯聯邦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代表沃羅特尼可夫(V. I. Voronikov)於九月八日在窩瓦格拉德(Volgograd)市紅十月區(Krasnoo-kryabriskiy okrug)，與該區的選民會談。沃某係該地區選出的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人民代表；按慣例，代表有向選民報告在蘇維埃工作狀況及詢問選民意見的責任。由於沃羅特尼可夫身兼俄羅斯行政首腦職務，因此在羣眾大會中的報告偏重於當前的改革問題。

沃某表示，共和國工業產值在今年頭八個月超出計劃的成長率，但是在經濟變革仍不穩定，在國民經濟一些部門仍嫌落後。特別是糧食、住宅、商品和服務部門，必須列為優先完成的任務。農業部門建立的新經營形式，例如農工聯合工廠、生產聯合企業、農業公司，係農工綜合體的環節；擁有較佳效率。應當更充分發揮企業與公民的副業、集體果園和蔬菜栽培的潛力。許多城市 and 地區的住宅建設發生困難，不僅是資料、資金不足，而且缺乏幹部。沃羅特尼可夫進一步說明改革的決定性條件是民主化，調和個人、集體和社會的利益，維持三者的平衡是重要的。但是首先需要促進公開的氣氛，批判、公開討論及解決社會生活中的困難問題。在黨、蘇維埃、經濟機關活動的民主形式獲得進展，特別是在經濟管理發展民主原則具重要地位。在第十三個五年計劃(一九九一~九五)期間，國營企業與聯合將全面實施經濟核算和財政自主的新經濟改革措施。蘇共中央與蘇聯政府公佈一整套改革方案，包括計劃、價格、物質技術供應、金融信貸、勞工管理等體系。此外，還涉及及經濟管理機關的簡化、縮編，藉以提高管理效率。在地方行政，將設立省級的生產經濟管理總局，協調生產單位與地方之間的利益，消除當中的矛盾。

從沃羅特尼可夫的報告顯示，俄羅斯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存在著一些困難或落後現象。經濟體系的全面改革和民主化管理在蘇共中央或俄羅斯，都被視為解決當前問題的迫切措施。而且開發公民和勞動集體的積極性、發展農業副業、鼓勵私人自行興建住宅和創業；都是針對問題而提出的，其中含有道德因素和利潤誘因。當然，作為蘇維埃人民代表需向選民提報工作成績；對於缺乏民主選舉內涵的蘇聯選民多少具有補充作用。

蘇聯價格體系的改革

蘇聯國家價格委員會主席帕福洛夫(V. Pavlov)於八月廿五日在真理報撰文說明蘇聯「價格結構的根本改革」。價格改革亦是蘇聯經濟改革當中一個極其重要環節，其影響深遠而廣泛。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為價格改革所下的界定是：「批發價格改革應為國民經濟建立健全情勢，為爭取生產效率、節約資源、產品品質建立更好的條件。關於零售價格，其改變不應導致勞動者生活水平的惡化；相反地，應當提高一定領域內的勞動者的生活水平，更充分實現社會正義。」根據帕福洛夫的解釋，價格改革包括：

一、取消政府預算支出中對於生產、產品和服務方面的補貼，這種預算支出一年超過七百三十億盧布。
二、產品價格必須反映生產成本。消除中間產品的補貼或價格低估情形，確實按社會必要勞動支出估計；最終消費產品實施周轉稅（即消費、交易稅）。

三、對於原料、燃料價格重新按實際成本支出估計，自然資源（土地、水的免費使用）亦應估價。

四、設定批發價格基礎，消除不合理高度支出的成本，此係因浪費、不合理的生產組織所造成。廢除工業產品與農業產品的雙重價格標準。

五、對於農工綜合體最終產品的採購價按照零售價；擬定零售價格改革模型和對居民的補償制度。（亦即提高勞動工資、養老金、津貼，以補償消費品漲價的損失。）

六、改善全國物價監督系統，防止企業任意提高價格以製造不合理的暴利。

蘇聯實施價格改革的明顯利益，首先是節省鉅額的補貼支出；第二，實際反映生產成本，高效率生產產品自然在市場上較具競爭能力。但是物價上漲則無法避免，比如發電用燃煤的成本每噸十八盧布，售價祇有十二盧布；一旦更改，至少要漲價百分之卅三。哄抬物價的現象更難應付，目前即有不少企業擅自提高價格。在可見的未來，蘇聯人民將普遍感受消費品大幅漲價的壓力，而工資所得的增幅可能無法完全抵償；特別是高度需求的消費品，包括季節性農產品、生活用家電產品，其價格最易偏高。

二日蘇舉行地方性的第三屆遠東會議

日蘇第三屆遠東會議於九月一日至六日在伯力（Khabarovsk，哈巴羅夫斯克）市舉行，這是由日本北海道和蘇聯哈巴羅夫斯克邊區兩地社會人士組成的地區性會議。首屆於一九八四年在伯力舉行，翌年在北海道札幌市舉行。此次會議

日方代表二五名，團長係眾議員安倍（Fumio Abe），名譽團長橫道（T. Ikonichi）係北海道知事；蘇方出席代表逾二五〇名，團長丹尼留克（N. N. Danilyuk）為邊區執委會（省政府）主席。會議分作四組進行：(1)俄屬遠東與北海道社會人士之間發展區域交流問題，(2)勞動者對於建立信賴與睦鄰氣氛、鞏固和平友誼的貢獻，(3)貿易經濟合作問題，(4)捕魚業問題。會議結束後的聯合公報指出：「雖然日本與蘇聯之間存在著歧見，但是俄屬遠東與北海道區域合作的發展有助於促進兩國間的信賴和睦鄰關係，並且對遠東和亞太地區的和平事業具有重要意義。」

此次會議主題雖係「支持遠東的友誼、睦鄰與合作」，但却具有濃厚的商業氣息。日方代表紛紛利用機會與蘇方簽訂合作契約，包括設立海產加工聯合企業、農牧業開發合作。而且參加經貿合作、捕漁業問題小組討論的人數多過於其他兩組。由於北海道與俄屬遠東毗鄰，而且北海道的冶金、採煤、造船、漁撈深受不景氣影響；因此當地人士謀思和蘇聯擴展經貿合作，特別是希望藉此擴大漁撈、水產加工合作。日本社會黨籍眾議員五十嵐（K. Igarasi）明確指出，北海道人士認為與蘇聯遠東建立直接聯繫較具利益，並且期望和蘇聯經濟改革、俄羅斯對外貿易結構改組等進行實際聯繫。亦即日方希望趁蘇聯對外開放之際爭取更多的商業利益。

蘇聯固然同意，甚至要求擴大合作，吸收日本科技、資金用於開發俄屬遠東與西伯利亞。但亦盼望北海道人士能致力於反對東京政府的反蘇政策及以北海道為前進基地的軍事擴建措施。不過北方四小島的領土爭執與日本的親美聯美政策將使日蘇關係難以有大幅度改善，儘管兩國關係已略有解凍。再者，這種地區性會議能否長期延續仍屬疑問。首屆會議係由北海道知事橫道努力促成的，橫道是社會黨人。一旦社會黨不能贏取知事一職，或下任知事無意於此；缺乏北海道地方政府支持的遠東會議可能中斷。